

書評

中國霸權的理論與現實

Chinese Hegemony: Theory and Reality

秦偉騰 *Wei-Teng Chin*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中國自改革開放轉向市場經濟後，經過 30 餘年的努力，綜合國力快速增長，2010 年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日本形成巨大的壓力，加上中日關係一直處在不和諧狀態，對日本造成影響，成因除歷史因素糾結之外，本書作者中西輝政認為是因為日本極度缺乏知識性的遠見性及整合性，也就是這種「沒有遠見的危機」，導致現今日本面對中國的種種困境。揆諸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研究明顯著重於歷史及文明因素，然日本迄今所做的中國研究，雖數量驚人，但社會卻沒有因此獲得對等的知識見解與成果，整體而言，日本至今的中國研究及評論，就是造成中日關係困境的原因。

基此，作者中西輝政身為一個日本人，從中華文化歷史的角度，將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以結構性的方式，深層次的闡述，重新思考對中國存在的認識，並檢視「何謂中國」這一本質性問題，並回歸中華傳統的思維理則，試圖說明改革開放後逐漸掘起的中國，在面對國際社會及日、朝、韓、越等周邊國家時，在外交策略上的不同運用，尤其是發生類似外交事件時，對於他國與日本的處理手段不同，從中梳理出造成不同的原因。

中西輝政指出冷戰後對帝國的議論焦點主要落於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上，然帝國不單只以龐大的力量統治、影響他國或周邊地區，而是必須抱持某種理念、價值觀或是偉大的原則，而隨相異的文明、文化體系，帝國的意義、現實的情況也會出現極大的不同。也就是說所謂的「帝國」唯有依循所屬的文明及歷史現況去思考，才能進一步了解，因此在思考「作為帝國的中國」時，就應當回到中國文明這一個獨立的文明體系中，連結作為「帝國」之中國所主張的論理與其歷史之現況，並做出對比研究，才能在處理與中國相關問題時，不致誤判情勢。

自秦朝統一中華帝國成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的二千多年來，也曾遇到數次中國失去「帝國」之姿的時期，如蒙古統治一個世紀、「五胡十六國」或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等混亂時期，帝國本身遭遇重大變化，並非是一持久的大帝國，然在此種劇烈的變化中，依然保有一貫性及不可思議的循環性，這也是中國文明史上的典型，因此檢視中華國際秩序的歷史變遷，不難嗅出二十一世紀中國如何構思國際秩序的端倪。

時至二十世紀末突然人們開始關心「亞洲式」概念，所謂的「亞洲式價值」指的是什麼？亞洲式民主主義、亞洲式經濟運作，這些奠基於「亞洲式共生」的國際秩序等議論，開始出現日常及時事性的問題討論，環繞在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中針對抽象的概念範疇進行無謂的操作、探究，中西輝政認為若能以更加貼近歷史過程，並重視實際狀況的歷史性敘述方法，即能闡明所謂的「亞洲式性質」。本書在探求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歷史性鏈結，從中國與周邊東亞諸國、諸民族間的關係所見的歷史性模式（Pattern）來思考其本質性的特徵，亦是深入「亞洲式性質」核心的一種嘗試。作者發現一種可稱之為「亞洲式粉飾」的運作模式，總是令問題深化、沉澱、堆積，發展成一種「矛盾的（超）長期性累積」之特殊現象，最後在經過一定的時間，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後，便由外在因素或事態本身的重擔而「體系自行崩解」，進而衍生出新的均衡（秩序）。

探究中國國際關係在歷史中形成的秩序觀，與西歐的秩序觀有何不同

特質，又具有何種「亞洲式性質」，皆是本書關注命題。一邊明確表明對峙、對立之立場，曝露出爭論點進而解決問題、形成秩序的西歐式對抗型秩序觀（Confrontational approach），另一方面則是截然不同的「亞洲型」，以「共識（consensus）」或「妥協（compromise）」為主要途徑。亦有研究者將後者稱為「亞洲式共生思想」，讓亞洲建立與西歐式途徑相異的國際秩序及社會關係觀念。

「亞洲式的國際秩序」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秩序之重要本質，而規範「中華」與周邊關係的因素可分為三項，一是中國與周邊各國之間的政治軍事上的權力關係，二是奠基於華夷思想的「中華」與周邊對於地位與權威的上下關係，與實際狀態或藏有實際企圖之現實產生對峙，三是尋求相互交流之經濟、文化性誘因，或是國內政治層面之統治正統性動機。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對峙，並於各個層面衍生出秩序意識，進而產生文明史上的「歷史性模式」。也是這三種要素交互影響中國與東亞周邊國家的國際關係，如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是屬於對等關係、朝貢關係、亦或是藩屬關係，在不同時期亦不斷的調整，但只要機會來臨，中華始終傾向於貫徹具有普遍性的華夷秩序，也就是反覆出現的帝國的衝動。

書中作者中西輝政利用過半的章節去闡述中華與周邊國家（越南、古朝鮮、日本及北方國家）的歷史及相互交往過程，包括平和時期的互遣使節、朝貢、封王與戰爭衝突等等，皆希望透過回顧歷史，重整中國對外關係發展的脈絡，以古鑑今，嘗試解釋現代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軌跡，尤其針對對日關係上，為何一直以來的「中日友好」總是政治口號，多數日本人總抱持「自以為瞭解」中國的形象，其實帶有許多問題，中國不論在文明的基礎上，還是歷史的結構上，與日本截然不同，在不清楚的情況之下，日本人所理解的中國常常是有誤區的，且在解讀中國對日政策時往往都面臨不知為何如此之困境。

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者費正清將十九世紀登場的西歐勢力及其文明對中國造成的影響概念化為「西方衝擊 (Western Impact)」，主要有三大要素：第一是「近代國際政治」之衝擊，理念上擁有對等主權的各個國家，各自獨立、對峙，以相互同盟或戰爭為手段，確保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也就是中國被迫參與此恆常性的國際體系，讓中國必須放棄自身世界觀及文明認同（除自身以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皆為屬國或未來不再產生相關聯的「夷狄」觀念）。第二是鴉片戰爭向中國宣告「西歐近代」的來臨，讓中國強制性被捲入奠基近代技術及工業革命所產生的近代資本主義，與世界性活動的海洋貿易的全球體系當中，加上 1842 年近代技術的軍事力量讓中國簽下南京條約，要求中華帝國接受本質上對等的國際關係，對中國而言是無庸置疑的衝擊，也讓中國不得不面對這「文明的挑戰」。第三是較中華價值觀更具普遍性的近代（西歐）式合理主義及個人主義式進步主義價值觀及生活體系帶來的衝擊，甚至動搖到以儒教道德為中心的「中華普遍主義」價值觀的根基。過去一個世紀左右，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領導人面對三項衝擊時，各自選擇不同的方式去應對、對峙或對決，也形成近代中國史的主軸。

時至今日，現代中國面臨的歷史課題仍非常嚴峻，隨改革開放而增強的國力，培育出新型態的民族主義，對日漸與國際社會接軌並接納國際秩序的中國而言，如何在國家主權、民族自決與國際秩序等核心觀念上採取作為值得推敲省思。近代中國對外部國際社會採取一貫的態度是主張「主權平等」（不介入他國內政是其衍生原則）與「民族自決權」，倘若中國真的轉向以主權平等、民族自決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那持續涵蓋、支配西藏、新疆等異族地域的正當性為何？再者若中國已接受近代主權論及國際法體系，依此概念台灣即便沒有得到北京政府的許可，依然可以合法地成為新國家、新政府。而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雖然中國嘗試應對各種政策性內容，但從反對自近代國際法原則提出的主張觀之，中國還處於「帝國的理論」之中。

現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連帶綜合國力增強，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與國際社會接軌越發頻繁，所面臨的國際問題也愈來愈多，不論在經濟上加入世貿組織，遵循國際規範行事，亦或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處理各國的政治紛爭，隨著國力增強所負擔的國際責任愈加重大，在中國自詡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同時，如何依照國際法（規範）處理國際事務值得觀察。惟囿於中國傳統中華天下的價值觀念影響，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紛爭時，在東亞周邊鄰國處理模式，跟與西方歐美等國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對於歐美等國不會依據國家實力大小，而是依循西方的秩序原則的普遍性架構規範（國際法）去操作，對東亞鄰國則多以華夷式傳統中華秩序的模式處理。中國在面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外交手段，一方面可說是彈性靈活，另一方面亦凸顯傳統中華秩序或者說是中華霸權的心態，在中國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是否意味中國將繼續隱晦的走向霸權，需要持續關注和觀察。

責任編輯：賴郁璇